

翻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滑移

——On Irritability 英译汉批评性分析

尤泽顺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摘要: 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的语境观对 On Irritability 原文与译文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后者相对于前者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滑移,即学术性向非学术性的滑移、性别指向的滑移、权势意识的滑移、隐喻思维的滑移、论述焦点的滑移,再次证明意识形态在翻译活动中具有不稳定性与动态性。将微观语言分析与宏观语境分析相结合能够有效地揭示滑移现象。

关键词: 翻译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翻译; 滑移; 批评话语分析; 语境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65X (2019) 2-0066-15

一、引言

意识形态问题是近年来翻译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不仅从翻译史角度探讨意识形态如何操纵与影响翻译(Fawcett, 1998; 徐英, 2015a),而且考察了意识形态如何影响译者对原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运用以及读者对译本接受(Even-Zohar, 1990; Gentzler & Tymoczko, 2002; Lefevere, 1992; Toury, 1995; 王东风, 2003)、翻译诗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Bassnett & Lefevere, 1998; Hermans, 1999; Munday, 2008; 卢志宏, 2015)、译者主体性与社会机制在翻译过程中的互动(Tyulenev, 2014; Wolf, 2012; 陈浪, 2014)、语言选择与翻(编)译的意识形态

收稿日期: 2019-01-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日、菲、印)涉领土争议双方的话语模式对比研究”(18BYY068)

作者简介: 尤泽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 外交话语、批评话语分析、跨文化交际

转换（徐英，2014，2015b，2015c，2016，2017，2018）等，揭示了意识形态与翻译之间的关系。但现有研究大多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静态系统，如源语和译语文本内在的属性、社会语境中先在的结构关系、译者所秉持的观念体系等，对其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稳定性和动态性关注不够。事实上，意识形态在翻译过程中经常出现滑移（shift）现象，即“微妙隐晦、不易觉察的变动或转移”（Sinclair，2002）。滑移可能出现在译文与原文之间，也可能出现在译文与译文之间或译文内部的不同部分之间等。本研究借鉴批评话语分析的语境观对 *On Irritability* 英语原文和汉语译文进行对比研究，揭示意识形态在两者间出现的滑移。

二、意识形态与话语

对意识形态与翻译互动关系的探讨与人类最早的翻译活动几乎同时出现并一直延续下来，但直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翻译的文化转向之后，由于学者们对意识形态、翻译活动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改变，意识形态问题才逐渐被纳入翻译研究的考察重点（Bielsa，2011：200）。

由于意识形态经历了“从中性降格为贬义，又逐步回归中性”的历史性反复和变换，它具有“不切实际的、梦幻式的、乌托邦式的、与事实不相吻合”的消极意义，又具有表示“概念体系、系统思维或理念”的中性意义。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视为一个中性概念（Pérez，2014；van Dijk，Aertselaer & Pütz，2004）。范戴克（van Dijk）承认意识形态与权力争斗具有密切联系，指出意识形态并不是天生就是虚假的或错误的（van Dijk，Aertselaer & Pütz，2004：xiii），它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是由于心理学所说的归因错误（attribution error）造成的。“意识形态从任何一个意义角度来说都没有虚假和真实之分，特别是当虚假仅被用于描述意识形态他者（ideological others）的思想时，情况更是如此。”（ibid.：xv-xvi）意识形态存在于任一社会团体或阶级中，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他们都通过不同的方式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包括三个方面：（1）认知因素，即个人用于创造新思想的信念和思维方式；（2）社会因素，即群体利益、社会权力结构和支配；（3）话语因素，即运用语言在社会中（掩盖或操控地）表达意识形态（van Dijk，1998）。意识形态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概念，而是一个包括知识信念、价值体系、个人生活的社会权力结构和规范、话语的表征方式等因素在内的综合概念。

在社会实践中，意识形态的内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产生动态的发展变化。一方面，作为社会世界的表征，意识形态出现在各种日常交流（语类）方式中，通过确保社会同质性的方式不断进行灌输，建立和维持其中的权力、支配和剥削关系（Fairclough，2003：218）；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本身也被塑造，因为话语实践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征事物和构筑人们的社会位置，“生产和再生产了不

同社会阶级、男/女性、民族/文化多数群体与少数群体等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Fairclough & Wodak, 1997: 258)。对于其不稳定性和可能出现的滑移必须对文本进行分析才能揭示。

三、翻译与意识形态

将意识形态和翻译联系起来时学者们大多使用的是贬义。两者之间的关系被进一步区分为翻译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translation)和意识形态的翻译(the translation of ideology)(Hatim & Mason, 1997; Pérez, 2014)。前者是指“译者的行为必然发生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他自己也是语境的一部分”,其翻译行为必然受到社会语境的约束,“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倾向”(Hatim & Mason, 1997: 111);后者是指“译者对文本进行加工时,必然借助于个人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对源文本呈现的世界进行过滤,由此创造出与源文本有所不同的译文本世界”(ibid.: 112)。换言之,前者强调的是译者行为受到了社会文化等整体意识形态的约束,后者强调的是译者行为对文本所隐含的意识形态的干预。事实上,翻译的相关理论范式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对两者影响翻译过程的不同认识。

意识形态问题是随着操纵学派的出现才在翻译研究中被明确提出来的。意识形态仍然主要被看作贬义概念,与操纵(Hermans, 1985)、扭曲或改写(Lefevere, 1992)等联系在一起。该学派认为,制约文学翻译过程的有文本内外两大因素,前者指批评家、述评家、教师和译者等专业人士,后者被称为赞助人,指能够促进或限制文学作品的阅读、书写和改写的权力因素(包括人和机构)。前者根据后者的要求从文本内部对文学系统进行控制,压制那些与主流文学概念(诗学)与社会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不够合拍的作品(ibid.: 14)。译者主要以语言为工具,对文学系统进行改写,导致文学系统之间相互渗透。“他不仅可能将一个文学系统中的某位作家或某个作品所创造的意象成功(也可能不成功)投射到另一个文学系统,而且可能将新的创作手法引入到另一个诗学系统,促使后者各个功能组成部分发生变化。”(ibid.: 30)当译者的语言手段“与意识形态和/或诗学性质等因素发生冲突时,胜出的往往是后者”(ibid.: 39)。操纵学派超越了以往研究,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文本因素,强调对权力、操控、意识形态等文本外问题进行考察,不仅把之前对意识形态问题含而不露的描述进行了明确的阐述和辨析,而且指出文本内外因素之间的联结关系。但是它过分强调翻译的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的翻译(即译者翻译行为对意识形态可能产生的干预作用或反操纵能力)放在次要地位(魏家海, 2004: 32),同时主要以静态的眼光看待文本内外因素的关系(尤其是强调文本外因素对文本内因素的单向制约),没有考虑到意识形态、译者、文本之间在翻译过程中一直处于动态平衡的发展状态。

对此翻译社会学从一出现就给予了关注。受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的建构主义结构观、场域理论、惯习、符号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等相关讨论的影响，翻译社会学主张翻译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必然与社会语境纠缠在一起：一方面，不管在什么阶段，翻译行为无疑都是由属于某个社会体系的个体来完成；另一方面，翻译现象必然牵涉到社会机构，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的选择、生产和流通，进而决定了翻译策略的选择本身”（Wolf, 2012: 132）。作为“参与整个翻译过程的行动者（agent）”，译者不管处于何种境况都表现出强烈的自信心和自我批评态度，愿意为自己的文化和社会实践活动负责，积极参与思考和解决各种与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密切相关的问题（ibid.: 136-137）。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通过服从、选择或规避社会机构和意识形态等对翻译的规约，对社会权力结构和机制进行干预和构建，其作用应该受到重点关注。因此，翻译研究应该兼顾考察社会结构和个人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既要考察各种社会机制对翻译生产、传播和消费的限制作用，又要考察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是要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揭示“译者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对译文进行秘而不宣、隐晦微妙的意识形态介入与干涉”（Munday, 2007: 197）。意识形态既包括了操控和规约等翻译的政治因素，也包括翻译活动涉及的译员培训机构、翻译职业机构、工作条件、翻译伦理及其他因素，已由原来的完全贬义逐渐扩展到贬义偏向中性。翻译社会学对译者的能动性进行了重新阐述，强调了译者行为对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参与和构建作用，体现了结构与行动者（译者）之间的动态发展以及意识形态的不稳定性。但是这也导致它对翻译外部因素的过分强调，对翻译内部（语言）因素的观照不足，越来越偏离翻译研究的本体讨论（语言转换），也越来越远离翻译母体（原文）的语言分析（武光军，2008: 80），对意识形态的不稳定性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综上所述，翻译研究应进一步关注和考察意识形态的动态性和滑移现象，通过对比分析译文与原文、不同译文以及译文内部不同部分的语言使用来揭示。毕竟翻译活动与其他话语实践活动一样，语言使用至始至终是唯一不能缺少的因素，是整个活动的中介，缺少语言使用因素，所谓的协商过程就无从谈起。不管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包括价值观和立场等）还是社会结构（包括主流意识形态等）或者其他因素，都是通过语言使用来构建和表征，对翻译的影响也是通过语言使用才能实现。语言选择与翻（编）译的意识形态转换（徐英，2014，2015b，2015c，2016，2017，2018）以及译者翻译语言抉择的关键之处（王斌华，2015）等相关研究的结论就是很好的例证。

四、话语、语境与翻译

把语言分析与译者主动性、社会结构等翻译文本的内外因素相结合进行考察能

够更全面揭示意识形态与翻译的互动关系。目前常用的方法之一是将批评话语分析视角/方法引入翻译涉及的文本进行对比(Munday, 2007, 2012; 胡开宝、孟令子, 2017; 姜秋霞, 2009; 孟令子、胡开宝, 2015; 王斌华, 2015), 基本前提是接受批评话语分析话语与社会互动的观点, 将翻译涉及的文本视为一种话语, 把翻译活动视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和再情景化, 是译者、文本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为建构过程(田海龙, 2016, 2017)。

翻译文本(话语)不再仅仅被视为由语言和非语言符号构成的文本, 而是包括篇章(text)、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篇章生产、流通和消费)与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三者在内的复合统一体, 与之相关的语境也分为四个层次:(1)语言内或篇章内上下文语境;(2)言语、篇章、体裁和话语之间的互文关系和互为话语关系;(3)语言之外的(社会)语境, 即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4)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语境(Wodak & Meyer, 2009: 32)。在篇章层面, 话语指的是语言/非语言因素在交际中的使用, 即“语言(书面的、口头的及它们与其他符号的结合, 如唱歌时与音乐的结合)、非语言交际(面部表情、身体动作、手势等)和视觉图像(如超文本、图片和视频等)”(叶起昌, 2006: 7), 对应的语境因素主要是上下文语境; 在话语实践层面, 话语指的是语言和非语言因素与有限语境(当下语境、说话者的意图、背景知识或者会话规则)(Pennycook, 1994: 40)的互动, 主要涉及互文语境和情景语境; 在社会实践层面, 话语指的是语言和非语言因素与更广范围内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对某一具体翻译文本的分析就是“对三个维度中的每一个维度进行分析”(Fairclough, 1995: 74)。篇章层面上的语言与非语言因素是话语的物质化形式, 也是话语研究中用于直接分析的部分。而它们与处于其他层面的有限语境以及更广范围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则是话语的概念化形式, 这种关系不能直接进行分析, 必须在篇章分析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这并不是说各个维度或不同层次语境的分析可以相互脱离, 相反话语分析必须“在不同层次之间来回转换, 从不同角度对研究发现进行评估, 使片面分析出现的可能性降至最低”(Wodak & Meyer, 2009: 32)。

翻译活动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 而是社会结构对译者行为实施控制与译者介入、反抗、塑造社会结构相结合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由于译者、文本和社会等多因素的作用, 产出的译文不可能传递或被解读出与原文完全一样的意义, 而是一种经过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ed)的话语(陈勇, 2017: 9), 是译者在外在压力与内在主体性双重作用下运用目的语对源语进行重新建构, 最终获得看似尽量符合源语和目的语语境的新文本。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属性, 同时又可能因为译者的积极介入(如选择特定

的语言表达)与其他因素(如对原文的不同或错误解读)出现滑移。

滑移往往以隐晦、不易觉察的方式出现,译文可能被批评为不忠实于原文或译得不好。导致出现滑移的具体因素往往难以确定,毕竟翻译活动涉及的因素太多。因此,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考察意识形态建构及其滑移现象必然要涉及话语的原文(语境)与译文(语境)的对比分析,也就是说要将具体话语的原文与译文分别置于各自的语境当中,从不同维度与相关语境分别进行分析,推理和确认所构建的具体意义和观念,通过相互对比找出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别。

五、意识形态在 On Irritability 英译汉过程中的滑移

本文选择第二十八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的英语原文 *On Irritability* (出自 *Philosopher's Mail*) 与主办方提供的译文(朱一凡、刘华文, 2016b)作为对比分析语料,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可比性。主办方还就评奖标准与翻译难点等在《中国翻译》上发表文章专门进行说明,并对典型的文本片段翻译进行详细解析,为了解译者思想提供线索。首先要对翻译涉及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社会实践考察,为篇章分析和话语实践分析作准备。对具体的文本片段进行篇章与话语实践分析,辨别其中的细微变化,必要时将之放在社会实践语境中进行验证。文中的意识形态概念采用的是范戴克等人提倡的中性含义。

1 历史文化语境

On Irritability 英译汉涉及的历史文化语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原文产出语境和翻译竞赛要求,前者是较为遥远的历史文化语境,后者是现实的社会文化语境。*Philosopher's Mail* 是部分学者 2014 年以来开展的一项实验,目的是证明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可以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所有发表的文章都是实验的成果。学者们以哲学家的眼光对目前占据各类报纸的新闻故事(如名人轶事、灾难和丑闻等)进行评论和分析,指出讨论名人并不仅仅是一种八卦,只要用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思考和表达,它可以引导人们对隐含于生活中的智慧和美好侧面进行探索。比如,哲学家关注贝克汉姆给社会带来什么启示,批评富豪女继承人塔玛拉(Tamara Ecclestone)奢侈的生活,从法国火车脱轨事件认识到生命的脆弱,要学会原谅别人,正确处理真正重要的事情,学会欣赏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他们指出,人性普遍的弱点是容易被美丽的外表所迷惑而忽视其他方面的痛苦,想要真正促进人性发展,就必须设法克服这个弱点,保持与泰勒(Taylor Swift)一样有吸引力的道德素养。哲学家希望告诉人们新闻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现在应该知道什么。

文章的作者皆为哲学家,具有扎实的哲学理论知识,对生活具有别样的理解。文章的读者既包括专家、学者,也包括普通读者,他们希望更好地理解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文章“朴实平白,以朴素的生活哲学为主,试图帮助读者解

决生活中的种种困顿”(朱一凡、刘华文, 2016a: 121)。所有文章雅俗共赏, 既有严肃认真的思想表达, 又有俏皮活泼的内容解说; 既有适量学术语言使用的长句、专业词汇和复杂词语, 又尽量用生活化的隐喻和表达法; 既有道德说教, 又竭力以叙述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On Irritability 作为其中之一也具有上述特点。

从竞赛要求来看, 主办方规定参赛译文须独立完成, 杜绝抄袭现象, 强调每个译者必须是独立的行为者。翻译竞赛结束后的总结给出了英译汉的具体要求, 即希望“译文要尽量忠实于原文(包括意识形态), 又要考虑译文语境(意识形态), 译者要‘舞姿优雅’”, 表明此次翻译必须尽量保持意识形态的稳定性, 同时也为译者发挥主体性以及原文与译文间的意识形态滑移留下了空间。

2 原文与译文间的意识形态滑移

意识形态是一个综合概念, 想要全面彻底地总结出 On Irritability 原文与译文意识形态之间的滑移现象是不可能的。本研究主要通过几个典型侧面及其例证来进行说明。

2.1 学术性向非学术性的滑移

On Irritability 原文具有一定的学术性, 使用了不少长句、专业概念、专业词汇和复杂词语, 同时又尽量使用平白的表达法或简单的隐喻。与原文相比, 译文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学术性向非学术性的滑移。

(1) Irritability is the tendency to get upset for reasons that seem—to other people—to be pretty minor.

原译: 易怒是动辄为一些在旁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恼怒的现象。

改译: 所谓易怒, 乃是人的一种性情变化倾向: 陡然间烦躁暴怒, 起因在旁人眼里却是小之又小。

irritability 是最重要的学术概念, 汉语释义是烦躁、易怒。单从词义来看, 汉语的“烦躁”往往是心中有气, “易怒”表示容易生气, 不一定心中有气, 用“易怒”来表达 irritability 已经窄化了含义。从全文语境来看, 哲学家讨论的 irritability 是一个从烦躁到暴怒的过程, 人们由于日常生活中隐而不露的原因, 某个时刻心情不是特别好, 恰巧有人(如伴侣)做了一些在他看来不太合适的事情, 引发了情绪失控(upset, 恼火的)。tendency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倾向释义外, 还有专指的(性格或性质上)倾向含义, 句中它是一个表达性格(变化)倾向含义的中性学术词汇。原译用了普通词汇“动辄”, 虽然看起来简洁明了, 却抹掉了 tendency 原有的学术性, 带有略为贬义的动不动就的意思。

(2) It was the most minor of criticisms and technically quite correct. And now they've exploded.

原译：你压根儿就没怎么批评他，且完全在理，可对方却大发雷霆。

改译：类似的提醒的确可以说是一种批评，但绝对是最微不足道的那一种，从技术层面讲，这并无任何不当之处。现在对方却为此暴跳如雷。

technically 是学术性词汇，指严格按照法律、规则或事实。原译的“完全”表达的是 technically quite，看起来很简洁，但失去了学术特征，而且把表达的意思绝对化，因为 technically quite correct 表达的从技术层面上说还很在理并不等同于完全在理。the most minor 作为修辞成分强调了批评的程度，And now they've exploded. 简短且独立成句带有强调含义，exploded 表明了爆发的突然性和强度。通过上下文中类似的语言与句式选择，原文从学术上精确地突出轻微和爆发之间的强烈反差，提醒人们注意问题的奇怪之处。从社会语境来看，原译基本上把学术特征和强调重点完全淡化了，论述的精确性大为减弱。

(3) ...one might even come face-to-face with that perennially surprising truth about relationships: that the other person is not an extension of oneself that has, mysteriously, gone off message.

原译：……对双方关系你甚至会面对那个令你惊诧不已的真相：对方并不是你自己的延伸、又莫名其妙地与你违拗失和。

改译：……双方在彼此关系上甚至得直接面对那个千古不变、令人奇怪的事实：对方并不仅仅是自己的“延伸”——对方并不仅仅是不知为何再也不听自己使唤的“延伸”。

truth 意为真理、事实，可能 perennially surprising（永远令人感到奇怪，而不仅仅是惊讶），因为下文描述的两个特征都是人们一直无法理解的奇特现象。extension 和 gone off message 是人的生理特征，需要借助属于社会语境的神经生物学基本原理进行理解，即人的全身都是受神经信号的控制，即使是 extension 部分也不例外。an extension of oneself that has, mysteriously, gone off message 字面上是不知为何没有接收信号的延伸部分，the other person is not an extension of oneself 表达并不是自己的延伸部分，而伴侣在平常往往误认为对方就是自己，和自己想法一样，或者至少是自己的延伸。原译用“不已”和“违拗失和”分别表达 perennially 和 gone off the message，模糊了原有的学术含义。

2.2 性别指向的滑移

女性主义翻译认为，几千年来男权思想一直影响社会各方面，包括人们的语言使用。不管是英语还是汉语，过去在使用第三人称单数泛指所有人时，男性第三人称单数一直是首选。尽管近几十年来中性代词的使用逐渐广泛，但翻译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政治问题仍然存在。On Irritability 的汉译也没有完全避免历史话语的影响，

性别指向出现了滑移。

(4) Your partner asks you how work went and the way they ask makes you feel intensely agitated. Your partner is putting knives and forks on the table before dinner and you mention (not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fork should go on the left hand side, not the right. They then immediately let out a huge sigh and sweep the cutlery onto the floor and tell you that you can xxxx-ing do it yourself if you know better.

原译：比如伴侣问起你工作的情况，询问的方式令你大为不快。又比如当**他**正为晚餐摆放刀叉，你提醒说（不是第一次了）叉子应该放在左侧，而非右侧。对方旋即一声粗叹，将刀叉一下扫落在地，冲你大吼，你摆得好，你就 XXX 自己来啊。

改译：生活之伴侣不过随口问问一天的工作是否顺心，你却为其询问之方式深感不快。晚餐前，另一半将刀叉等摆放于桌上，你（可能不止一次）提醒说，叉子应该放在左手边，不是右手边。话音刚落，对方马上一声长叹，随即把满桌子刀叉一股脑儿全扫到地上，嘴里还愤恨地咒骂着：你 XXX 的要是觉得自己做的更好就自己做好了。

your partner, you, they 体现了家庭伴侣从简单问候发展为狂躁暴怒的过程，始终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性别指向。哲学家想告诉大家男女都有可能会易怒。原译把 your partner 译为“他”，使译文出现了明显的性别指向，似乎发脾气的一方是男性。从历史文化语境来看，此现象与男权社会里的其他行为一致，进一步固化了男性往往占主导地位，女性常沦为受害者的刻板印象，推翻了原文在性别与易怒之间关系上所持的中立立场。

(5) ...terrified of spoiling what remains of their years on the planet in the company of someone who it appears cannot in any way understand a pivotal point about conversation, or cutlery, or the right time to order a taxi.

原译：……害怕自己在这世上的下半辈子被伴侣毁掉，因为**他**抓不住说话的要领，连刀叉也摆不好，甚至连叫辆出租车都会搞错时间。

改译：……害怕会白白浪费自己的有生之年去陪伴另一个人——一个看起来似乎连双方谈话要点是什么、刀叉等餐具应如何摆放或者什么时间叫的士最合适等简单问题都无法正确理解的“废人”。

their 和 someone 同样是中性词，表明男女都可能会经历同样的事情。原译把 someone 译为具有明确性别指向的“他”，表达似乎是男方不会做事情造成女方恐惧和易怒。

2.3 权势意识的滑移

福柯（2001：3）认为，权力关系和不平等渗透在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里，权

力、知识与话语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同构关系，权力、知识由话语来实现，话语既是权力、知识的产物，又构成权力和知识。权势关系在话语中往往以隐晦的、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方式构建出来，需要敏锐的观察和分析才能揭示出来。

(6) *Tempers can stay even because individual students do not have very much power over teachers' lives.*

原译：个别学生并不能对教师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因此教师才能够保持冷静。

改译：由于学生个体并没有太多权力去干涉老师的做法，老师这种淡定心态完全可以一直保持下去。

哲学家指出，老师能否做到不过于在乎自己的教学效果，不过多运用自己的权力去干涉学生的行为是教学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但前提是 *individual students do not have very much power over teachers' lives*。在教育过程中老师相对学生来说具有较大的权力，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学生虽然有时对老师不是特别在乎的方式不是很满意，且持此看法的学生可能不止一个，但他们作为个体没有太多的权力去迫使老师作出改变。前后文清楚表达了师生之间的权力对比关系，原译直接将此淡化为“影响”，遮蔽了其中的不对等。

2.4 隐喻思维的滑移

隐喻思维是遍布于人类日常生活、思想、行为之中的一种生活方式，即人们经常自动地、无意识地以一种事物（本体）看待、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喻体），尤其是“把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投射到另一领域，用于理解那些存在理解困难的概念”（Chilton, 1996）。由于 *irritability* 是一个学术性较强的问题，相关讨论可能会给普通读者的阅读和理解造成困难，哲学家在不少地方使用了隐喻将语言表达生活化，一方面可以增强文章的逻辑性，提高阅读的趣味，另一方面可以减少阅读障碍。

(7) *The journey begins by recognising the role of fear in irritability in couples.*

原译：首先要认识忧惧在伴侣间的易怒情绪中所起的作用。

改译：实际上，讨论此问题的学术旅程得从正确认识恐惧感对于引发伴侣间易怒行为的作用开始。

the journey 与前文的 *so we deserve to get a lot more curious about it* 和随后提出的问题形成上下文连贯。哲学家结合社会文化语境把易怒现象的探究过程比喻为一段旅程，把 *recognising the role of fear* 比喻为旅程的开始。原译省去了 *the journey begins* 包含的隐喻，不仅使原有的生活化叙述转变为较为生硬的逻辑分析，而且使问题的分点讨论显得非常突然。

(8) *They feel ineluctably led to deliver their “lessons” in a cataclysmic, frenzied*

manner (the door slams very loudly indeed) not because they are insane or vile (though one could easily draw these conclusion) so much as they are terrified.

原译：他们之所以会情不自禁地用突然翻脸、暴跳如雷的方式来“教训”（伴随着“砰”的一声摔门声）对方，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失去理智或心存恶念（尽管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而是因为他们害怕。

改译：此时，双方都无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冲动：用某种毁灭性的、近乎疯狂的方式（“嘣”的一声巨响把门重重关上）给对方“上一课”。这并非因为他们真的失去理智或行为卑劣（尽管人们很可能会轻易地得出这一结论），而是因为俩人都吓坏了。

哲学家把生活中的伴侣给对方提建议隐喻为课堂上教师给学生上课（deliver a lesson，后文的 love classroom 也是隐喻），指出课堂教学和给伴侣提建议获得成功的前提条件都是不要特别在乎效果，而生活伴侣间却缺乏这一条件，由此导致一方狂躁暴怒。原译的表达使原有的隐喻思维被转化为直接表达，阅读趣味性大大减弱，并使原来上课的中性含义变得略带贬义，导致此处论述与译文的上下文和整体思想不一致。因为文章强调一方的善意提醒就像给学生上课一样是中性的，只是方式不对，被另一方误认为是故意找茬。从社会语境来看，如果真的是一方主观上想教训另一方，那就勿怪另一方发火了。

2.5 论述要点的滑移

论述要点存在于句子、篇章、段落乃至整篇文章，表明了论述的重点所在。论述要点经过精心组织和合理安排可以使文章逻辑连贯，主题突出。On Irritability 一文出自哲学家之手，条理清晰，论述要点环环相扣，前后照应。在翻译过程中论述要点经常会在不经意间出现滑移。

(9) All this wisdom we reliably forget in love's classroom, sadly because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threat seldom hastens development.

原译：然而在爱的课堂上，我们准会把这些明智之举抛诸脑后，这很悲哀，因为越是咄咄逼人，越不利于对方的成长。

改译：不幸的是，在爱情的“教室”里，以上所有“至理名言”肯定会被彻底忘光。这实在让人痛心，因为双方的相互威胁如果有增无减，问题就基本难以更快得到解决。

all this wisdom 是对前文的概括，将之前置于句首一方面是为了与前一段落形成更好的衔接与连贯，另一方面是为了强调其常常被遗忘这一反常现象。从词汇在社会语境中使用的一般趋势来看，development 主要用作褒义词，在此指良性发展。哲学家认为，increasing the level of threat 是不可能获得（良性）结果的。下一句对此

作了更为具体的阐述，即伴侣之间如果觉得受到伤害或威胁，就不可能 grow more reasonable。论述要点不是原译提到的个人成长，而是伴侣双方能否采取更为合理的行为使事态朝良性方向发展。

(10) The decoding may take time, perhaps half an hour or more of concentrated exploration for something that had until then seemed as if it would more rightfully deserve an instant.

原译：解读这一切可能要花些时间，本来似乎须臾就能想明白的事情，这时候却需要花半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来专心探究。

改译：完全理解这一切可能需要花费双方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是半小时专心探究，也许还不止半小时。半小时之后，他们才发现，先前“难以理喻”的东西看起来其实只需一眨眼功夫就应该弄明白了。

the decoding 指的是前一段提到的伴侣双方对 surprising truth 的理解过程，until then 是半小时之后双方已经理解的那个时候，had seemed as if it would more rightfully deserve an instant 使用虚拟语气表示看似一眨眼间就应该理解，但事实上却用了半小时或更久。哲学家强调的是伴侣双方对问题的认识出现转机的时间点，即他们必须经过理性思考一段时间才能理解，也只有到那个时候双方才会觉得这些问题其实很容易理解。原译描述的要点是本来容易理解的事对于愤怒中的夫妇来说变得不容易理解，只有等到双方冷静下来之后才发现问题其实很简单。

(11) But it is immensely difficult to transfer the lesson in generosity (and accuracy) that we gain around to children and apply it to someone with a degre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r a pilot's license, or to whom we have been married for three-and-a-half years.

原译：但是我们从养育孩子上学会的宽容（和精准的判断），要用到有着工商管理文凭或飞机驾照的成人身上，或者用到已经结婚三年半的伴侣身上，就绝非易事了。

改译：问题在于希望自己把育婴中学会的宽容对待（和准确理解）等方式转用于对待儿童是极其困难的；同样的，希望自己用这种宽容方式对待拥有商业管理学位、或拥有飞行执照、或已经与自己结婚并共同生活了三年半时间的另一半也是极其困难的。

围绕着日常群体生活哲学家对与 irritability 相关的三种关系（伴侣之间、师生之间、父母和婴儿之间）进行论述和对比，发现父母能准确理解婴儿的问题，很宽容地对待他们的反常行为，最终保证婴儿健康成长；教师中有部分不是特别在乎教学效果，忽略或漠视学生的反常行为，宽容对待学生，最终反而使教育获得成功；

伴侣之间往往没有注意到对方反常行为的背后同样隐藏着更深层的原因,很难宽容地对待对方,从而诱发了生活中的易怒问题。此句论述的要点是在处理师生关系和伴侣关系时人们无法像父母对待婴儿那样宽容。the lesson in generosity (and accuracy) that we gain around 就是从育婴中学会的宽容对待(和准确理解), transfer...to children 就是教师在学校将此经验转用于教育儿童, apply it to someone with 就是伴侣用此方式对待另一方。原译只提到用宽容的方式对待伴侣,把处理师生关系问题完全略去。

六、结语

翻译是译者、文本、社会与许多其他要素共同参与的过程,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从话语角度和多层次语境观出发对比分析 *On Irritability* 的原文和译文,发现后者相对于前者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滑移,包括学术性向非学术性的滑移、性别指向的滑移、权势意识的滑移、隐喻思维的滑移和论述要点的滑移,说明意识形态在翻译活动中具有不稳定性 and 动态性。将微观语言分析与宏观语境分析相结合能够有效地揭示其滑移现象。

参考文献:

- [1] Bassnett, S. & A. Lefevere. 1998.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2] Bielsa, E. 2011. Some Remarks on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 Reflection on the Global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Sociological Works[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 199-215.
- [3] Chilton, P. 1996. *Security Metaphors: Cold War Discourse from Containment to Common House*[M]. New York: Peter Lang Verlag.
- [4] Even-Zohar, I. 1990. Polysystem Studies[J]. *Poetics Today*, (1): 1-268.
- [5] Fairclough, N.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M]. Singapore: Longman Singapore Publishers.
- [6] Fairclough, N. 2003.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M]. London: Routledge.
- [7] Fairclough, N. & R. Wodak. 1997.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A]. In T. A.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8] Fawcett, P. 1998. Ideology and Translation[A]. In M. Baker (ed.) *Th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C]. London: Routledge.
- [9] Gentzler, E. & M. Tymoczko. 2002. *Translation and Power*[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10] Hatim, B. & I. Mason. 1997.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M]. London: Routledge.
- [11] Hermans, T. 1985.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M]. London: Croom Helm.
- [12] Hermans, T. 1999.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 Explained*[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13]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4] Lefevere, A.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Routledge.
- [15] Munday, J. 2007. Translation and Ideology: A Textual Approach[J]. *The Translator*, (2): 195-217.
- [16] Munday, J. 2008. *Style and Ideology in Translation: Latin American Writing in English*[M]. London: Routledge.
- [17] Munday, J. 2012. *Evaluation in Translation: Critical Points of Translator Decision-making* [M]. London: Routledge.
- [18] Pérez, M. 2014. *Apropos of Ideology: Translation Studies on Ideology—Ide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M]. New York: Routledge.
- [19] Pennycook, A. 1994. Incommensurable Discourses? [A] In M. Toolen (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C]. London: Routledge.
- [20] Sinclair, J. 2002. COBUID 英汉双解词典[Z].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1] Toury, G.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22] Tyulenev, S. 2014. *Translation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 [23] van Dijk, T. A. 1998.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24] van Dijk, T. A., J. Aertselaer & M. Pütz. 2004. Introduction: Language, Discourse and Ideology[A]. In M. Pütz, J. Aertselaer & T. van Dijk (eds.) *Communicating Ideologies: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Discourse, and Social Practice*[C]. Frankfurt: Peter Lang.
- [25] Wodak, R. & M. Meyer. 2009.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istory, Agenda, Theory and Methodology[A].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26] Wolf, W. 2012.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nd Its “Activist Turn”[J].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2): 129-143.

- [27] 陈浪. 2014. 新世纪以来的意识形态翻译研究[J]. 外国语, (6): 6-73.
- [28] 陈勇. 2017. 再情景化与政府工作报告英译研究[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5): 8-14.
- [29] 福柯. 2001. 话语的秩序[A]. 许宝强, 袁伟.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C]. 肖涛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30] 胡开宝, 孟令子. 2017. 批评译学研究: 翻译研究新进展[J]. 外国语, (6): 57-68.
- [31] 姜秋霞. 2009. 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32] 卢志宏. 2015. 再次解读 Patronage[J]. 中国翻译, (4): 19-23.
- [33] 孟令子, 胡开宝. 2015. 基于语料库的莎剧汉译本中 AABB 式叠词应用的研究[J]. 外国语, (1): 82-89.
- [34] 田海龙. 2016. 跨文化交际的话语解读: 再情景化模式[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50-60.
- [35] 田海龙. 2017. 作为社会实践的翻译——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思考与方法探索[J]. 外语研究, (3): 60-64.
- [36] 王斌华. 2015. 对外传播话语翻译抉择的“关键之处”: 批评翻译学的实证路径探索[J]. 中国外语, (2): 1-7.
- [37] 王东风. 2003. 一只看不见的手: 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控[J]. 中国翻译, (5): 16-25.
- [38] 魏家海. 2004. 操纵学派译论综观[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3): 29-32.
- [39] 武光军. 2008. 翻译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J]. 外国语, (1): 75-82.
- [40] 徐英. 2014. 新闻编译中的意识形态翻译转换探索[J]. 中国翻译, (3): 98-102.
- [41] 徐英. 2015a. 翻译意识形态研究的发展历程探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7): 105-112.
- [42] 徐英. 2015b. 从语态选择的编译改动看意识形态的翻译转换[J]. 上海翻译, (3): 37-41.
- [43] 徐英. 2015c. 新闻编译中的名词化改动与意识形态转换[J]. 中国翻译, (3): 90-94.
- [44] 徐英. 2016. 新闻编译中的主位选择改动与意识形态转换[J]. 山东外语教学, (1): 102-108.
- [45] 徐英. 2017. 引述选择的编译改动与意识形态的翻译转换[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 33-42.
- [46] 徐英. 2018. 机构新闻翻译情境下情态选择的编译改动与意识形态的转换[J]. 外语教学, (3): 93-97.
- [47] 叶起昌. 2006. 走向话语的意识形态阐释——以超链接文本为分析对象[M].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 [48] 朱一凡, 刘华文. 2016a. 细微之处见真章[J]. 中国翻译, (6): 121-124.
- [49] 朱一凡, 刘华文. 2016b. 说说易怒[J]. 中国翻译, (6): 119-120.

collected texts transcribed from the US congress debates on climate change from 2001 to 2017, this study uses a corpus-based approach to observe the key words and their concord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analysis, explores the speech acts and discourse practice, analyses the debate focus and discursive strategi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interprets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policy instability.

Key words: discourse studies; corpus; the US Congress; climate change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Shift of Ideology in the E-C Translation of “On Irritability”

YOU Ze-shun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n context to contrast the ideologies embedded in the English text “On Irritability” and its Chinese version and demonstrates that the latter shows certain degree of ideological shift from the former in the academic nature, gender implication, power awareness, metaphorical thinking and arguing point to instantiate the instable and dynamic nature of ideology in the translating process. The combination of detailed linguistic analysis with macro-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context can effectively reveal the ideological shifts.

Key words: the ideology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ideology; shif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ontext

A Sociolinguistic Study of Translator’s Stance of CPC Documents Translation Based on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in 2018

LIANG Na

Abstract: The sociolinguistic study of stance is concerned with the dynamic, interactive, cooperative and indefinite constraint and 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of discourse practice. This paper makes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addition of indicative personal pronouns and modal verbs in the translation of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in 2018, and explores the dynamic construction and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lator’s stance in the process of CPC documents translation, which manifests the will of country, exerts the intersubjectivity of translation participants and highlights the obligation of China as a major country.

Key words: sociolinguistics; CPC documents;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or; stance

A Contras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Quality Group from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HE Wei & GAO Ran

Abstract: After reviewing previous studies of adjectives, adverbs and adjectival groups, adverbial groups in different linguistic schools, this paper contrasts English and Chinese quality groups in two dimensions of potential structures and semantic functions from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to reveal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form and function of English and Chinese in describing the quality of thing or situation, as well as